



植根文化沃土 坚定文化自信

□史雪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需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均与出版有关。出版以保存、弘扬和传播本民族或本土文化为核心, 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承担着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在文字诞生以后, 现代印刷技术应用之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 出版活动的对象和最终成果主要是书籍。

书籍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图书出版是文化创新和文化积累的过程, 历史上江苏地区的出版活动精彩纷呈, 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

永嘉南渡以后, 东晋及南朝官方组织进行了持久的出版活动, 形成了《晋元帝四部书目》等多种大型目录学成果, 正式确立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四部书目分类体系。齐梁年间文风大炽, 文学进入自觉时代, 江苏地区的图书出版事业进入辉煌时期, 如《宋书》《文选》《文心雕龙》等名家名著迭出, 引领时代潮流, 在各自领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隋唐时期是书籍卷轴装帧艺术发展的高峰, 印刷术的发明应用, 促进了书籍从卷轴装到册页装的过渡与发展。这一时期, 江苏苏州一带形成了唐诗选集的刊刻热潮, 扬州地区产生了元选学, 为区域文化增添一抹亮色。宋元时期, 私刻书坊遍布江南, 图书出版盛况空前, 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被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江苏是明代出版业的重镇。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南京主持编成, 通俗文学经典“三言两拍”在江苏刻印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短版、拱花等彩色印刷技艺在南京首创, 《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四大科学巨著的编刊出版与江苏息息相关, 江苏地方志实现“全覆盖”, 并产生了丰富的修志理论。郑和七下西洋、江苏刻工远渡扶桑促进了明代出版业的国际交流, 江苏在明末东西方以图书译介推动文化交流事业中传出了意义非凡的第一棒。清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江苏特殊的区位优势、经济条件、政治影响和文化积淀, 确立了当时江苏全国文化中心 and 出版中心的地位。清代江苏出版业引领全国, 官刻、私刻、坊刻三个系统并驾齐驱, 各有特色。清代江苏刻书总量庞大、种类丰富、制作精良, 将传统出版技术推向极致并采用新的出版技术, 开始向现代出版业转型。民国时期, 从新式印刷机器的引入, 到编辑和印刷工艺的渐次提升, 再到出版管理体制的日益完善, 江苏出版印证了中国出版从传统机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的整个过程。这既是江苏古代文明发展的成果, 也为江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江苏出版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 江苏出版成绩斐然, 表现突出, 为社会主义出版强国建设持续作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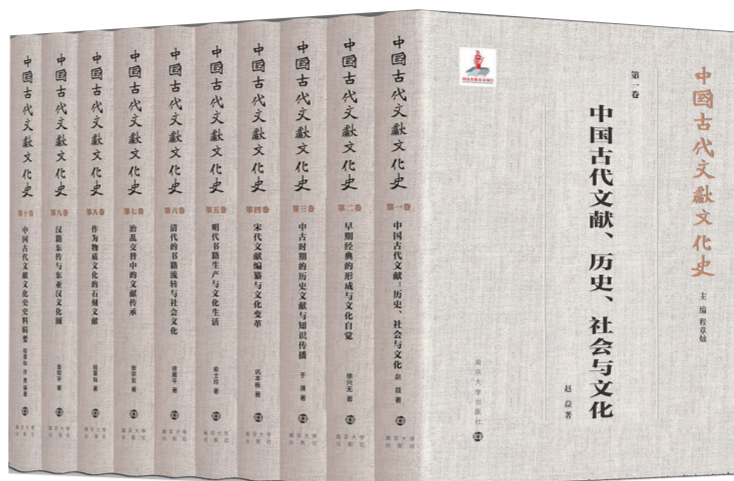
系统阐述江苏出版的发展脉络, 全面总结江苏出版的丰富成果, 对于传承江苏出版的优秀品质, 展示江苏这片土地上文化的多彩和出版的魅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具有重要意义。《江苏出版史》(五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第一部以江苏出版为研究对象的通史性著作, 注重出版活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以时间为线索, 聚焦地域出版活动发展, 分五个时期对江苏的出版活动作深入、透彻的分析, 揭示了出版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江苏在出版方面的深厚积淀, 做好文化传承, 增进文化自信,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出版史、文化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 《江苏出版史》作为出版学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 在出版事业推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构建古代文献文化史学术体系

□程章灿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 绵延至今, 从未断绝。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中国古代文献, 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献不仅是文化的载体, 也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生生不息, 成为中华文明一大特色。“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一研究课题, 就是以文献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献, 前者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证基础, 后者突出文献研究的宏观视野。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认识中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变化及其文化价值, 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中西学术传统都很重视对于文献本身的研究。涵盖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和典藏学等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 历来以整理图书为己任, 尤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 表现出强烈的延续文化学术的历史使命感, 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文献资源, 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更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西方学者的“书籍史”研究, 则不同于图书馆学、目录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图书史”, 它是一种文化史的观照, 其核心是将书籍理解为文化历史中的一股力量。西方学者运用西方书籍史的视角, 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社会文化历史的关系, 产生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成果,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本土学者在书籍史方面的探索。但西方学者主要关注近世以来的书籍与印



刷, 对其他时代、其他形态的文献关注不足, 亦较少利用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学术资源。因而, 结合中西学术积累进行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 是一个极富意义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方向。

2010年年底, 以程章灿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团队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经过十年的辛勤耕耘, 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终告完成。2020年, 十卷本《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荣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标志着这一成果获得了学界同行的认可。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总体特

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结构体系上, 以问题为中心, 以历史发展为线索, 对文献文化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观照。总体框架大致以绪论与专论相结合, 既重视各卷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也突出各自的专题性和独特性。第二, 具体操作上, 简牍时代、写本时代与印本时代并重。在继续深入进行明清书籍史研究的同时, 显著填补宋以前文献文化史的空白; 在突出其历史阶段性的同时, 重视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态多样性, 动态把握其历史进程, 特别重视中国古代文献外传对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意义。第三, 理论方法上, 从原始文献出发,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兼收, 文字

材料与图像资料互相参证, 考据与义理并重, 旨在总结中国古代文献的民族特色, 彰显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本丛书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 在文献发掘、研究方法上力求创新; 在传统的古籍学资料之外, 重视国外的书籍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文献。此其一。本丛书由多位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承担, 注重“长时段”的时间观念, 弱化单纯的线性进程, 各以一个较大问题为中心, 多维度阐释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丰富内涵。此其二。本丛书的学术思路是将文献与文化相互融合, 从文献的实证角度阐释文化, 从文化的宏观视角审视文献, 突破了已有研究成果将文献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割裂的格局, 借鉴“书籍史”此一新文化史研究视野并力求超越, 研究对象从“书籍”扩展至“文献”, 时间范围从宋元明清扩展至整个中华文明史, 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化历史内涵, 特别注重发掘古代文献的文化建构意义。此其三。

本丛书虽然已有十卷之多, 字数多达400万, 但是, 相对于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领域, 这只是扬帆起航而已。我们深知, 已经完成的工作尚有诸多不足, 还有大量的领域有待继续深化拓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全流程溯源保障粮食安全

□袁华山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粮食安全是永恒的课题, 粮食质量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党领导下百年粮食发展的启示: 基于质量管控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一书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百年粮食发展历程中得到启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从全流程质量安全管控的视角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思路、新举措, 以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党领导下百年粮食发展的启示》以“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 即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体系, 着力在粮食质量安全管控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粮食产前质量调查预警, 收购质量控制, 储存期间质量安全, 出库质量管控, 质量检验检测技术创新, 实验室安全管理, 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转基因粮食管控以及集团化质检体系改革等与国家粮食安全、企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 提出加快推进粮食

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具体思路和措施, 确保中国的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本书紧密结合作者长期在粮食行业工作的实践, 从粮食质量安全管控和检验检测技术发展的角度, 进行多层次、多对象、多方法、多视角的研究, 并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关于粮食质量安全研究的部分论文和科研合作课题项目成果等, 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全流程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思路。

本书可供粮食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及教育教学培训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参考。

阐释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的通识著作

□赵宪章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与其相关的图像艺术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简要描述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 将不同时期的文学图像及其特征呈现出来, 讨论这些图像与文学文本(语言艺术)存在怎样的关系等, 是《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的基本任务和总体目标。这一任务和目标的达成, 无论对文学专业还是对艺术专业的学习者, 抑或对一般文艺爱好者, 都是很有意义的。本书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和文艺爱好者, 也算是一个跨学科的尝试, 尝试文学与艺术的跨越与融合、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交汇与贯通。

既然是“中国文学图像史”, 就需要在本书的开篇对其概貌作一简要描述。最主要的是历史分期问题, 恰当的历史分期有益于我们对它的宏观把握。

需要明确的是: 无论文学史分期还是图像史分期, 都不能与朝代更替画等号, 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朝代更替。后者为历史分期提供了时间链条, 从而规定了历史言说的顺序和停顿。就“中国文学图像史”而言, 关于它的分期应顾及“文学”和“图像”两个方面, 尤其是前者, 因为“文学图像”是一个偏正词组, 即“文学的图像”; 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所以, “中国文学图像史”分期还应顾及汉语史。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学图像是文学语象的延宕和视觉化, 它使不可见的文学语象成了可见的。而汉语语象必然影响到文学图像, 汉语史也就必然影响到文学图像史。总之, 只有确立多维参照, 才能有效避免臆断。

当然, 无论顾及什么, 无论选择多



少参照, 最根本的还是要立足于文学图像本身, 即就中国文学图像的不同历史形态作出客观分析。所谓“历史形态”, 即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特殊性, 特别是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的关系特征, 或曰“语图关系”“文图关系”方面的总体特征, 并非拘泥于个别现象或个别特征。

据此, 以笔者之见, 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先秦两汉——萌发生成期; 晋唐——生发完善期; 宋元——范式塑形期; 明代以降——延展再生期。

需要说明的是: 如此描述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及其分期, 主要还是基于作为“视觉”(画像)的文学图像。因为相对于作为“识像”的书法艺术, “视觉”毕竟是中国文学图像史的主体部分。单就书法艺术史而言, 晋唐才是其范式塑形的黄金期。“识像”与“视

像”的这种历史错位, 显然与其各自的功能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实用性方面, 两种文学图像的差异是显著的——语言文字作为“识像”的实用性, 应是其备受宠爱从而早熟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学图像史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应该探索正确的、适宜的研究方法, 以便收获较大裨益。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确定,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

毫无疑问, 文学图像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图像”。这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决定了文学的本体属性, 这是基本的学术立场, 也是研究的出发点, 然后才延展到与其相关的图像, 并且紧紧盯着二者之间的关系。

将语象和图像作为基本理论范畴, 或者说将二者的比较研究作为文学图像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不仅是研究对象使然, 而且另有外的、更深层和更现实的意义, 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时可以体感到的、在“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 人文学术对此应该有所回应。

“图像时代”对文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人所共知。我们还应该看到, 在这一负面影响背后, 更有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 传统的唱和、和谐关系已被“图像时代”所颠覆。问题在于这一趋势才刚刚开始: 图像在技术的支持下, 表意功能及其诱惑力魔幻般地增强; 而语言表意与技术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 图像对语言的替代不但不会止息, 而且会呈现出一往无前的强势, 并且会愈演愈烈, 看不见

终结。那么长此以往, 人类的语言、思维、思想、情感、文化与社会交往等, 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语言符号可能患“渐冻症”吗? 语言艺术可能退缩到“杭育杭育”派吗? 这不是儿戏, 而是一个严肃的未来学问题。但是, 我们甚至整个人类对此还知之甚少。尽管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存在论等对此有所触及, 但是这方面的认知才刚刚开始, 甚至无法从学理上解释家长们何以希望自家孩子喜好读书而非沉迷于“读图”。这就意味着, 它不仅是一个极具学理性的问题, 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现实问题, 是一门“顶天立地”的学问。文学与图像、语象与图像的比较分析,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现实意义。

如果立足于本土资源建构符号学, 或者说借鉴符号学的观念与方法重新反观中国文学图像史, 就会呈现一幅颇具民族特色的语图关系史图卷。毫无疑问, 这一“新知”是原创的、中国的、现代的, 是中学借鉴西学的产物。同样毫无疑问的是, 沿着这条路径反观中国文学图像史, 一定会有更多、更大、更有意义的收获。这既是本书所努力的方向, 也是留给读者和学界的思考——希望本书的读者或学者在这方面特别用心, 通过批阅本书激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方面思考文学与图像的关系; 另一方面通过文图关系思考语图关系, 以及中国文图关系的民族性。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的“语图比较符号学”会自然生成, 无须人为炒作, 就像新兴的文学与图像研究那样, 没有任何非学术的外力引发, 全是源自学术的内在驱动力, 自然而然地生成、繁荣。